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

肖超

(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为探究相对于民国三十多年的政治、思想等重大变革,而当时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业(如地理学译著出版)飞速发展之原因,在介绍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出版概况,分析这一时期其地理学译著特点的基础上,对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著者、译者和编者群体身份进行了描述。分析认为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兴盛的4个原因:商务印书馆推行改革、民国地理学教育的发展、西方地理学教育的发达和留学生回国。

关键词:商务印书馆;地理学;民国时期;译著;著者;译者;编者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1-0076-07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此后的三十余年间,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发生了重大变革。作为思想文化重镇的商务印书馆在民国前20年得到了迅速发展,规模雄居亚洲出版企业之首。然而,1932年的“一·二八”国难使商务印书馆遭受重创,编译所、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等被毁。在王云五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的书籍出版产业复兴较快,起到了引领国内出版业的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商务印书馆辗转于香港、长沙、重庆等地,图书出版受到了制约。

翻译出版业是商务印书馆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出版业得到飞速发展,商务印书馆成为当时非常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据统计,1912~1935年,中国350家出版机构与团体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的译著(不包括古籍、文学作品、儿童读物)为13300多种,仅商务印书馆就占了3350多种,即25.2%^[1]。无论是在学科内容的选择,还是在著作出版国别的倾向上,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出

版业都留下了时代的烙印。笔者着眼于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翻译出版,试图通过对地理学译著出版史的研究,折射出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发展状况和这一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的现实。

一、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概况

根据相关书目,笔者对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数量做了统计,发现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在国内极具地位。在简要介绍地理学各分支学科译著出版情况的基础上,将商务印书馆与其他出版机构地理学译著出版情况进行了比较。

(一) 地理学译著数量之统计

根据《商务印书馆历年出版物分类总计》,商务印书馆在1911~1950年间共出版图书14251种,计26016册,其中历史、地理类1443种,计3007册^[2]。历史、地理类图书占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图

收稿日期:2015-08-2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5YJC870025)

作者简介:肖超(1987-),男,湖北钟祥人,讲师,管理学博士。

书总量的 10.1%。若将 1911 年和 1950 年的数据去除,便得到商务印书馆在民国年间的图书出版总数。可见,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类著作约占商务印书馆出版总量的十分之一,这一比例相对较高。那么,地理学译著占多大比例呢?

商务印书馆和学界并没有对民国时期地理学译著的出版数量做出细致统计,但仍然可以经由《(生活)全国总书目》来统计 1935 年前地理学译著所占比重。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地理图书有 120 种,占国内地理图书出版总量的 27.97%。除商务印书馆外,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生活书店、钟山书局等出版机构也参与了地理图书出版。在 429 种地理图书中,地理学译著有 94 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地理学译著有 60 种,在地理学译著总量中占到了 63.83%。商务印书馆的地理学译著在其出版的地理图书中也占到了一半。可见,商务印书馆非常重视地理学译著的出版,在国内的地理学译著出版中占据了极大份额。

商务印书馆在地志类译著出版中更是占据了垄断地位。在《(生活)全国总书目》收录的 70 种各国地志中,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其中的 43 种,占 61.4%。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43 种地志中,38 种是译著,只有 5 种地志是中国人编著的。译著在商务印书馆地志类图书中占到了 88.37%。

综上,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地理类图书中,地理学译著占据一半份额。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地理学译著占《(生活)全国总书目》中地理学译著总量的 63.83%。可见,商务印书馆在民国时期地理学译著出版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 地理学各分支学科译著出版概况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181 种地理学译著。其中,地理学理论与方法译著 6 种,人文地理译著 42 种,地理学史译著 2 种,经济地理译著 7 种,区域地理译著 81 种^[3],其他 43 种。可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地理学译著以区域地理译著和人文地理译著居多。区域地理译著有 81 种之多,包括 73 种世界地理译著和 8 种中国地理译著。在 73 种世界地理译著中,《少年史地丛书》收录的地理学译著多达 43 种,这套丛书是民国时期世界地理译著出版的集大成者。

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42 种人文地理学译著,最为出色的是一系列人文地理学通论的出版。

1930 年,张其昀译、竺可桢校的《人生地理学》出版,该书分为 6 个部分:人生地理学之希望、人生地理学之发达与雷次儿之学说、法国对人生地理学之新贡献、美国与其他各国之人生地理学、人生地理学第一部名著发表后之评论及其几种切要的工作、人生地理学历史之地理与政治地理,书后附录有《人生地理学上题目分类之纲要表》。《人生地理学》一书明确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认为人生地理学在于“研究各种人类生活,如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等,与自然地理学之各种现象之相互的关系”^[4]。虽然该书以“人生地理学”命名,但实际上是一本关于人文地理学学术史的著作。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海初与郑次川合译的《人生地理学原理》。该书被《万有文库》收录,共有 5 册 8 编 22 章。此 8 编分别为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人类和地位的关系、人类和地形的关系、人类和水的关系、人类和土壤矿产的关系、人类和气候的影响、人类和动植物的关系、人类相互的关系。该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涉及到地球、地形、水、土壤、气候、生物等方方面面。最后一编《人类相互的关系》,介绍了政治地理、国际关系方面的内容。

1931 年,张其昀翻译的《社会科学史纲:人生地理学》出版。该书和 1930 年出版的《人生地理学》是同一本书,只不过其中的一些翻译用语发生了变动。例如:《人生地理学》翻译为“雷次儿”,该书翻译为“拉策尔”。同年,盛叙功编译的《交通地理》出版,此书根据富士德治郎的《世界交通地理概论》编译,概述世界交通状况、分道路、铁道、内陆航路、海上交通、空中交通等 7 章。1935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日本野口保市郎著、陈湜译述的《人文地理学概论》。该书从地理学之意义及分类、自然环境与人生之关系、世界人种及其分布、人口、村落及都市、原料产业及其资源、工业、商业、交通、国家及领土等 10 个方面介绍了人文地理学学科。同年,开明书店出版了盛叙功翻译版本。商务印书馆的译本采用文言文,而开明书店则采用白话文,更加通俗。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两家出版机构在同一年出版不同译者的两个版本,表明当时地理学翻译出版界竞争较为激烈。

在这些人文地理译著中,冯承钧翻译的历史地理译著是一大亮点。冯承钧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中外交通史家,他获巴黎大学学士学位后,师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深造。他通晓英文、法文、梵文等多种语言,翻译了多种西方历史地理著作。其中,在商务印

书馆出版的有《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苏门答刺古国考》《史地丛考》《交广印度两道考》《史地丛考续编》《郑和下西洋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编》《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马可波罗行纪》《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四编》等。

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自然地理学译著也较多,包括《地文地理集成》《海洋》《地球》《景观地理学》《阿尔卑斯的冰河》《河川》《大陆移动论》《通俗天文学》《自然地理学》等24种。

游记也是这一时期的出版特色之一。1929年至1935年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卡奔德世界游记》系列,包括《坎拿大及纽芬兰》《不列颠三岛和波罗的海诸国》《澳洲新西兰南洋诸岛游记》《巴拉那亚马孙沿途详记》《从坦支尔到的黎波里》《从法兰西到斯干的那维亚》《日本与朝鲜》《从开罗到乞斯曼》《圣地及叙利亚》《爪哇与东印度群岛》《中美洲和西印度群岛》《智利与阿根廷》《阿拉斯加》等13种译著。

(三) 商务印书馆与其他出版机构地理学译著之比较

除商务印书馆外,其他出版机构也译介了一批经典的地理学译著。民国前十年,参与译介地理图书的出版机构有上海的广学会、美华书馆、群益书社和公民书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明书店、钟山书局、世界书局和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地理学译著,代表译著有开明书店的《人文地理学概论》和《中国的地理基础》,钟山书局的《新地学》和《人地学原理》,世界书局的《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原理》,中华书局的《人种地理学》和《地理学发达史》等。

此外,华兴书局、中华学艺社、世界出版合作社、辛垦书店、时与潮社、正中书局、光明书局等中小出版机构也出版了部分地理学译著。20世纪三四十年代,解放区根据地出版机构也出版了一些地理学译著,如中国出版社《苏联概况》、上海耕耘出版社《亚洲苏联》等,这些地理学译著以介绍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地理状况为主。

综上,民国时期中华书局、世界书局、钟山书局、开明书店等出版机构也都出版了一批极具分量的地理学译著,但与商务印书馆相比,这些出版机构译介的地理学译著数量不多,出版较为分散。

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地理学译著种类

多,在出版数量上占有较大优势。但在一些重要的译著出版中,商务印书馆并没有占得先机。从美国著名地理学家葛德石的著作译介中可见一斑,葛德石著作有两种由开明书店译介出版,正中书局和中华书局出版各一种,只有《亚洲之地与人》于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特点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特点体现在4个方面:较强的理论性、多用作教科书、参与翻译的地理学者较多、多以丛书形式出版。

第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地理学译著具有较强的理论性。首先,商务印书馆译介了《现代地理学观念》《地理学序论》《数理地理学》《地理哲学》等一批具有深刻理论价值的西方地理学理论著作。王勤培翻译的《近代地理学》就是一部重要的地理学理论著作。该书包括近代地理学的开始、地形和侵蚀作用、冰和冰的作用、气候和天气、植物地理学原理和欧洲北美洲的主要植物系统、动物的分布、栽培的植物和豢养的动物、欧洲种族的分布和它的原始、矿产的分布和工业与都市位置的决定等9章,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其次,地理学分支学科通论性质的译著出版较多。这一时期出版的人文地理、经济地理、自然地理等方面的译著均体现了较强的理论性质。《人生地理学原理》《人生地理学》等人文地理理论译著、《经济地理学原理》等经济地理理论译著、《自然地理学》等自然地理理论译著的出版一方面表明了西方地理学的成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内地理学界对地理学理论的需要。再次,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的译著得以开枝散叶,译介门类越来越细。《交通地理》《交通地理学概论》《农业地理》等经济地理学门类译著,《植物地理学》《动物地理学》《景观地理学》《地形学》等自然地理学门类译著,《民族地理学》《地理政治学》等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译著,在这一时期的出版数量大幅度增加。这些译著的译介出版说明民国时期地理学学科体系渐趋完备,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发展正走向成熟。

第二,地理学译著多作为教科书使用。《世界地理之改造》即作为地理教科书使用。齐鲁大学历史系主任奚尔恩在《〈世界地理之改造〉序言》中就提到:“本校历史系亟思译作华文,藉供教材,庶

于中国学,子不无裨益。曾以此意请卜君,卜君慨许。乃取其书之最近第三次出版者,详为述译,间于译文中稍加损益,以期适合中国学生之用。”^[5]可见,翻译该书是用于教学。《小学生文库》所收录的《冰雪中的儿童》等5种地理学译著,也作为小学生的课外阅读材料使用。

第三,民国时期参与西方地理学著作翻译的地理学者较多。张其昀、胡焕庸、王勤堉、冯承钧等均是具有影响的地理学者。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政治地理著作《战后新世界》由张其昀、王学素、黄静渊、诸葛麒、胡焕庸、向达等地理学者联合翻译,体现了民国地理学界对地理学翻译出版的重视。

第四,民国时期地理学译著多以丛书形式出版,当时收录地理学译著的丛书有《少年史地丛书》《自然科学小丛书》《地理学丛书》《汉译世界名著》《史地小丛书》等。

三、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著者、译者和编者

地理学译著的翻译、出版与流传,取决于著者、译者、编者、读者四大群体。笔者对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著者、译者、编者群体身份进行分析论述,进而总结其特点。

(一) 著者群体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地理学译著主要来自英、美、日、法四国。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英国地理学译著53种,美国24种,日本42种,法国12种。英国作者主要有樊南摩(Fennemore J)、布牢温(Browne E A)、非耳格林(Fairgriene J)、杨氏(Young E)、哈第(Hardy M)、钮碧君(Newbiggin M J)、鲍尔杰(Baulger G S)、达德利(Deudley)、斐格莱(Fairgrieve J)等。美国作者有卜赖尔(Blair R)、鲍曼(Bowman I)、卡奔德(Carpfnter F G)、西蒙·纽康(Newcomb S)、恩格伦(Engeln)、葛德石(Cressey G B)等。法国作者有沙畹(Chavannes E)、伯希和(Pelliot P)、费琅(Ferrand G)、白菱汉(Brunhes J)、马东(Martonne E)、法里士(Faris J T)等。日本作者有高桥纯一、富士德治郎、横山又次郎、野口保市郎、早坂一郎、藤田丰八、野满隆治、平竹传三、白鸟库吉、小川琢治、小牧实繁、北田宏藏、松尾俊郎、黑正岩、阿部市五郎、石桥五郎等。

美国地理学家葛德石(Cressey G B)是民国地理学译著作者的代表。其著作《亚洲之地与人》中

文版于1946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另有薛贻源翻译的《中国的地理基础》于1945年开明书店出版,王勤堉翻译的《苏联国力的基础》1947年在开明书店出版,程鸿与叶立群翻译的经济地理著作《苏联力量的基础》1948年在中华书局出版。葛德石与竺可桢、翁文灏、黄国璋、涂长望、张其昀、胡焕庸、李旭旦、任美镔等中国地理学者有着交往。他通过在商务印书馆等机构出版地理学著作,以及与具有欧美留学背景的中国地理学者的交往,传播了西方地理学思想,加深了中美地理学的交流,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

(二) 译者群体

笔者对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第一译者进行统计,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410种地理学译著中,翻译两种以上地理学译著的译者有54人。这些译者翻译出版了166种地理学译著,占地理学译著出版总量的40%。在54位翻译两种以上地理学译著的译者中,民国时期的译者高达29人。其中,翻译4种及以上地理学译著的有12人。可见,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者较为集中,翻译出版的译著数量较为丰富,译者群体稳定。

民国时期,翻译较多地理学译著的译者集中于商务印书馆职员群体。其中,吕金录翻译7种,王勤堉、顾德隆、张其昀翻译5种,孙毓修、汪今鸾、郑次川翻译4种,黄静渊、贺昌群翻译3种。这一时期出版的《少年史地丛书》大多由商务印书馆职员翻译。顾德隆、郑次川、汪今鸾、黄静渊等在任职期间翻译的地理学译著数量较多。郑次川、汪今鸾各自翻译的4种译著均为《少年史地丛书》译著。黄静渊译的3种,有两种是《少年史地丛书》译著。

译者翻译的地理学译著出版时间较为集中。滕柱翻译了英国人非耳格林(Fairgriene J)与杨氏(Young E)的《欧洲与不列颠(人生地理)》《世界各地的人民(人生地理)》《新大陆(人生地理)》3种世界人文地理方面的译著,以及《美国一瞥》一种世界地理译著,均出版于1925~1931年间。陈锦英翻译了《克什米尔一瞥》《伦敦一瞥》《人类的住所》《印度家庭生活》4种译著。这些译著均为世界地理译著,出版于1926~1933年间。汤尔和翻译了《北满概观》《到田间去》《东省刮目论》《黑龙江》4种地理译著。此4种均译自日本的中国地理译著,出版于1930~1937年间。

商务印书馆职员外的其他译者之所以翻译地理学译著,与其自身学科背景、留学经历等有着密切关

系。盛叙功 1923 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1928~1929 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暨南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教授,以世界经济地理、世界历史地理研究见长。他翻译了《交通地理》《农业地理》两种经济地理译著,以及《河川》一种自然地理译著,此 3 种译著均出版于 20 世纪 30 年代,其中,有两种著作译自日本,这和盛叙功留日经历有关。

(三) 编者群体

民国时期,商务版地理学译著的编者主要来源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史地部。1902 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了编译所,蔡元培担任第一任所长。1903 年,蔡元培因苏报案离开上海,编译所所长由张元济接任。商务编译所最初由国文、理化、英文 3 个部组成。1922 年 1 月,王云五正式就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在接任编译所长的第一年,王云五主持了编译所改革,对编译所实行按学科分组。王云五在《初长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与初步整顿计划》一文中说明了按学科设置编译所的意图:“此为就编译所原设各部酌予调整,俾更合于学术分科性质。”编译所设总编译处,由原先的 4 个编译部扩充为国文、英文、史地、哲学教育、法制经济、数学、博物生理、物理化学、杂纂 9 个编译部。史地部是 1922 年新建立的编辑部门^[6]。1922 年,编译所史地部部长由庄百俞担任,成员有傅纬平、谭廉逊、陈俊生、陈稼轩、马轶群、孟稚蓉、蒋公伟、严君实。1923 年,史地部部长由朱经农接任,成员未变。1924 年,朱经农继续担任史地部部长,成员有谭廉逊、王伯祥、陈俊生、陈稼轩、马绍良、孟宪文、熊仲甫、黄善伦。1925 年,史地部部长朱经农继续担任,成员有王伯祥、陈俊生、叶绍钧、陈稼轩、马绍良、熊仲甫、孟宪文^[7]。可见,编译所史地部基本维持了 8~9 人的规模,直至 1932 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将编译所撤销。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创办时职员人数较少,后来逐年增加。在 1922 年王云五担任编译所所长前,编译所职员以留日学生为主,后来以由欧美归来的留学生居多。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职员留学国别的转变,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留学潮流的变化。编译所职员留学国别的变动,是商务印书馆译著来源国变化的原因之一。

四、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兴盛的原因

20 世纪 20~40 年代是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

出版的第一个高潮。“五四”运动前后,留日学生逐渐减少,更多人选择赴欧美国家求学。随着欧美地理学留学生的回国,地理学翻译出版来源国逐渐由日本转向欧美。海外归来的地理学者担任地理学译著翻译,民国时期地理学译者逐渐由之前以商务印书馆编辑为主,转为以高校地理学者为主。

笔者认为,民国时期地理学翻译出版兴盛的原因在于 4 个方面:商务印书馆推行改革、民国地理学教育的发展、西方地理学教育的发达、留学生回国。

(一) 商务印书馆推行改革

民国成立后中华书局的崛起,引发了商务印书馆教科书出版和销售危机。在竞争者的压迫以及馆内工潮和管理不善等问题的冲击下,商务印书馆不得不探索改革之路。1916 年前后,张元济曾提出改革方案,但由于高凤池等人意见不同,改革并未取得实质进展。1918 年,张元济辞去编译所所长职务,改由高梦旦担任。翌年“五四”运动发生,新文化运动对包括商务印书馆在内的文化界带来了巨大冲击。高梦旦自以为无法胜任新思潮下的工作,请辞编译所长,并邀请胡适担任。1921 年,胡适到访,在此期间对商务印书馆的改革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并推荐王云五前来工作^[8]。王云五接任编译所所长后,对编译所进行了整顿和改组。商务印书馆之前以出版教科书、工具书和古籍为主,王云五到任后积极编撰丛书,并系统地制订了翻译出版计划。

1930 年,王云五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虽推行“科学管理法”引发争议,但其实权得以扩大。“一·二八”国难复业后,王云五取消编译所,增设编审部,同时将商务编译工作委托外间包办^[9]。这样,由商务印书馆编辑翻译的著作减少,高校的学者有更多机会参与西学著作翻译,从而提升了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质量。《百科小丛书》《汉译世界名著》等丛书的出版,使翻译著作有更多出版的机会。因而,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繁荣与王云五的改革有重大关系。

(二) 民国地理学教育的发展

中华民国教育部规定大学文科及高等师范学校设置地理课程。在课程设置中,将地理列入规定的教学科目,并且在高等师范学校中设立了历史地理部。在大学中,把地理学单独列为一门,包括在文科之中。民国政府在高等院校设置地理学门类,体现了民国政府对地理学科的重视。

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各界也对地理学教育抱有期望。地理学被认为是“救国启

民”的先行科学,是“新邦建设之一动力者”。学界也对地理学寄予厚望,《地理学会发起旨趣书》中就强调了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性:“内政,外交,民生,国防,凡所举措,无不赖有地理研究为其根柢。中国幅员广阔,民族物产并极繁赜,地理研究尤极重要。方今内忧外患交迫而来,生聚教训,条理万千。”^[10]民国地理学教育的发展主要体现为地理学教育机构逐渐增多,民国高校非常重视使用西方地理教材。

1. 地理学教育机构增多

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设置历史地理类,这是中国地理学高等教育的开端。民国成立后,地理学教育和研究逐年兴盛,地理学教育机构逐渐增多。1912~1919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相继成立历史地理部或文史地部。1921~1923年,东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昌师范大学相继开设地学系或史地系。随着地理学科的发展,各高校地理系开始从史地系中独立出来。1928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分为历史系和地理系,地理学系从史地系中独立。1929年,清华大学地理学系、中山大学地理学系、燕京大学地理及地质系成立。1930年,中央大学地学系分为地理系和地质系。在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两门学科是不分家的。地理系的独立表明中国地理学承袭了西方地理学的特征,正由传统地理学向西方地理学转变。此后,金陵女子大学、东北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相继建立了史地系^[11]。1936年,全国共有大学51所,开设地理院系的高校有9所。这9所高校地理院系分别是:中央大学理学院地理系、清华大学理学院地学系、北平师范大学理学院地理系、中山大学理学院地理系、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地理系、勤勤大学教育学院博物地理系、东北大学文学院史地系、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文学院史地系、大夏大学附设师范专修科史地组。

地理学教育机构的增多也使得高校地理系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在这种形势下,高校地理教师需要从事地理学研究,学生需要地理学教材,西方地理学著作的翻译显得尤为迫切。

2. 地理教育注重西方教材的使用

民国时期译介的地理学著作多取材于国外的地理教材。这些外国地理教材翻译出版后,也在国内作为教材使用。万有文库版的《人生地理学原理》,在全书开篇附有《教师须知》,介绍了更好地教授该门课程的方法。一方面,要利用好练习题。《教师须知》提到:“若要使这本《人生地理学原理》教起来

收效不致踏空,各章后面所附的习问练习和问题应该要充分的利用才行。”“对于所附各问题应注意下列两点:第一,应有正确的统计,不可为浮光掠影的概说;第二,对于文字纪述而外,尚应制作地图,以资比较。”另一方面,书中的许多问题是“富于弹性”的。《教师须知》也从地理学的角度谈到了文中原理在不同地方的适用性。在教学中,应该注重学生的乡土地方观念。《教师须知》中提到“本书所讨论的各种原理以及各种问题,都应先就本地方应用起来,然后以此为起点,以求了解世界其他穷远的处所”。此外,《教师须知》中还推荐了应该购备的普通参考书、专门参考书、挂图等^[12]。

《人生地理学原理》等地理学译著,在国外原本就是作为地理学教科书使用的,这表明民国地理教育注重西方地理学教材的使用。这些教材的使用,不仅传播了西方的地理学知识,还介绍了西方先进的地理教育方法,对中国地理教育的发展大有裨益。

(三) 西方地理学教育的发达

民国时期地理学译著出版的兴盛与西方地理教育的发达是密切相关的。西方地理学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重大。1874年,德国在大学里设置了地理学系,这是西方国家中最早创立的地理学系。此后,地理学高等教育在西方国家蓬勃发展起来。至20世纪初,已达到较大规模。地理学家张其昀在阅读了美国地学会编辑赵格君(George L G)的报告后,认识到西方地理学的发达。他在《最近欧洲各国地理学进步之概况》一文中提到:“近代欧洲地理学之发达,以英、法、德、意四国为最。德国有地学专家七十人;法国之大学共十六所,无一不设有甚完备之地学系;英国意国著名之大学地理科亦不下十数。此外小国如瑞士瑞典其大学地学教授之成绩,又多为异国学者之所仰慕。”^[13]由《欧洲各国大学地理系详表》可知:英国大学共18所,设地学系共16所,其中10所并设研究院;法国国立大学16校皆有完备之地学系;德国23所大学,每校至少有一完全之地理教授职;意国大学共21校,设地学系者12校,此外9校乃本无文科者,又高等学校亦多教授地理。当时,欧洲地理学已包括方志、人文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人种地理学、植物地理学、古生物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地文学与地质学、气象学与气候学、海洋学、地图学、探险、地理教育15个门类^[13]。可见,20世纪初欧洲地理学教育规模已经较为完备,地理学门类已经相当齐全了。

在里昂中法大学获博士学位,执教于清华大学地理学系。

五、结语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地理学翻译出版在中国地理学翻译出版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其地理学译著不仅在数量上领先于其他出版机构,而且翻译和出版质量颇高,为地理学学术的普及和地理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地理学译著作者多为西方地理学界知名学者,译者和编者均具有较高学术水平,为当今翻译出版业和学术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启迪。

参考文献:

- [1] 许敏.上海通史:第10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2] 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3] 肖超.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研究(1897~2012)[D].南京:南京大学,2014.
- [4] 白菱汉.人生地理学[M].张其昀,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 [5] 卜赖尔.世界地理之改造[M].于道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 [6] 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1卷[M].陈江,辑注.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 [7] 郑峰.多歧之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知识分子研究(1902~1932)[D].上海:复旦大学,2008.
- [8] 王学哲,方鹏程.商务印书馆百年经营史(1897~2007)[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9] 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10] 翁文灏.附录——本会发起旨趣书[J].地理学报,1934(1):183-190.
- [11] 鞠继武.中国地理学发展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 [12] 亨丁敦,克兴.人生地理学原理:一[M].王海初,郑次川,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 [13] 张其昀.最近欧洲各国地理学进步之概况[J].史地学报,1922(1):139-146.
- [14] 朱家骅.中国地理研究之重要[J].地理,1942(1):1-2.
- [15] 马娟,周川.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由仿日转向仿美的原因探析[J].煤炭高等教育,2008(1):49-51.

(下转第101页)

(四)留学生回国

留学生是传播西方地理学思想的主体。留学生的回国,是民国时期地理学译著大量出版的原因之一。留学生的翻译出版行为,让西方地理学体系本土化后呈现在国人面前。

留学生回国,与民国时期高等学府的重视不无关系。当时,国外大学毕业生更能获得教育机构认可。1913年,民国教育部《私立大学规程》规定国外大学毕业生可以担当私立大学教员。由此,国外大学毕业生成为大学教师的首选。

中英庚款分配给地理留学生名额直接推动了赴英地理留学。朱家骅在1942年撰写的《中国地理研究之重要》一文提到:“中英庚款董事会廿二年派送第一届留学生时,特有地理名额之规定,以后相沿罔替,所派研习地理之留学生,现多已学成归国,分在各机关学校服务。”^[14]李旭旦、任美镠、鲍觉民、徐近之这4位中央大学学生,即为中英庚款受益者。李旭旦、任美镠回国后,任教于中央大学地理系,使中央大学成为全国地理学研究重镇。赴英地理学留学生分布较为集中。由于地理学家罗士培(Roxby P M)在利物浦大学任教,因此利物浦大学成为留英地理学生的聚点。地理学家涂长望、林超的导师即是罗士培。经济地理学家吴传钧和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分别于1948年和1949年在利物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吴传钧在中科院地理所工作,侯仁之执教于北京大学。

留美学生也在民国地理学翻译出版活动中有较大的影响。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标志着中国的学制从仿日转为仿美^[15]。作为民国地理系教师的重要组成部分,赴美留学生在民国地理学教育体制建构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竺可桢是赴美地理留学的先驱,他于1918年从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博士毕业,回国后成为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组织翻译了《新地学》等译著。胡先骕是哈佛大学农学博士,回国后成为著名植物学家,翻译了《世界植物地理》。克拉克大学是民国时期赴美地理留学的中心,毕业生有罗开富、赵松乔等。

除了英美两国外,法国、德国等国家毕业的留学生,也翻译了不少地理学译作。地理学家胡焕庸早年留学于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留法期间,他参与翻译了鲍曼(Bowman I)的《战后新世界》一书,该书于1927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28年回国后,他任教于中央大学地理系,成为竺可桢先生的得力助手,参与翻译了《新地学》一书。洪绂于1932年